

●新论快览

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

隐 喻

张 沛

隐 喻 界 说

所谓“隐喻”，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打比方”。但这一定义过于简易，非但不足以把握隐喻的本质，甚至还会产生某种误导作用。在大多数人看来，“隐喻”纯粹是一个修辞学概念，它表示一种与“明喻”、“借喻”并列平行的比喻类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往往还存在着另一认识误区，即将中国固有的“隐一喻”范畴、作为修辞学术语的“隐喻”以及西文“metaphor”一词的汉语对译相混淆。这三种“隐喻”的内涵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可以说是“比兴”、“意象”、“意境”等古典诗学范畴的基型，而后者（大众理解的“隐喻”修辞）仅在修辞层面上与“隐一喻”或“metaphor”相对应；至于“metaphor”，它在当代隐喻研究者那里已成为“隐喻性”的化身而统率着庞大的修辞学、诗学、语言学、认知哲学诸“隐喻家族”。本文所说的“隐喻”兼顾三者，因此把它称为“喻”或者“譬喻”也许更为恰当。不过该术语已经约定俗成，这里仍从众沿用，只要明白其实际内涵就是了。

隐喻是当代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西方研究者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并达成某些基本共识。他们对隐喻的界定大致是这样的：

隐喻：一种隐含的类比（an implied analogy），它以想像方式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并将前者的特性施加于后者或将后者的相关情感与想像因素赋予前者。<sup>①</sup>

隐喻：希腊语的“转换”（meta 意谓“跨越”；phor 意谓“运送”）：将某物运过去。故隐喻将某物视为另一物。<sup>②</sup>

隐喻：一种紧缩的语词关系，其中某一观念、意向或象征可能通过另一（些）观念、意向或象征的存在而提高含义的生动性、复杂性或广度。<sup>③</sup>

在隐喻中，本义指示某一事物、行为的语词或表达，被应用于另一明显不同的事物或行为而并不自认为是比较。<sup>④</sup>

上述诸家是从比较论与替代论（下详）的角度来界定隐喻的，而当代隐喻互动论者就讲得更明白了：

在当代隐喻研究中，“隐喻”一词的用法已有所不同。如今它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a cross-domain mapping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sup>⑤</sup>

所谓“跨领域映射”，也有人称为“图式的转换”、“概念的迁徙”与

① Holman, Hugh. 1960.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rev.).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Inc. 281.  
 ② Frye, Northrop (et al.). 1985. *The Harper Hand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282.  
 ③ Preminger, Alex (ed.). 1986. *The Princeton Handbook of Poetic Term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6.  
 ④ Abrams, M. H. 1988.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5<sup>th</sup>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tson, Inc. 65.  
 ⑤ Lakoff, Georg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Ortony, Andrew (ed.). 1993.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3.

“范畴的让渡”(a transfer of a schema, a migration of concepts, an alienation of categories)<sup>①</sup>。质言之,隐喻涉及人类感情、思想和行为的表达方式在不同但相关领域间的转换生成。

不过,这一界定显然有些过于宽泛,事实上它只回答了“什么是隐喻”的问题,尚不足以将隐喻同其他有关范畴(如符号、象征)区分开来,即其未能回答“隐喻是什么”的问题。为此,我们还需对上述定义追加若干权数(weights),它们是:“类比”(analogy)、“双重视域”(double vision)、“感性意象”(the sensuous image)以及移情的“泛灵投射”(animistic projection)<sup>②</sup>。

“类比”指甲对乙的关系等于丙对丁的关系时将甲与丙相互替换。如生命的老年类似时日的黄昏,故“人生的黄昏”隐喻了老年。就“人生的黄昏”这个隐喻而言,生命与时日构成两种不同的经验域或意义的“双重视域”,二者通过“聚焦”而凝为具有张力结构的隐喻体。这里,“黄昏”充当“感性意象”(隐喻的“载体”)图像化、实体化了本来难以言传的“老年”经验(隐喻的“主旨”),而后者则赋予“黄昏”这一自然现象以生命机体的特性。这种移情式工作机制便是“泛灵投射”。事实上,一切隐喻均可还原为认识主体“我”或“体验”(bodily experience)对外界(客观现实)所作的“投射”。综观以上四点,隐喻仍归结为意义(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在“我”——“与我有关的非我”两种领域间的转换生成。

诚如保罗·利科所说,“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表达”<sup>③</sup>;隐喻作为人类固有的自身表达方式,是与生命同源同位的有机体。显而易见,单凭界定、分析的公式演绎远不足以把握这一自身不断转换生成的隐喻机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借助功能性描述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本质。事实上,“跨领域映射”的提法

已然暗示了如下一种事实:隐喻是一种意义于其中转换生成的函数关系(功能而非本体)。进一步界定,即:

隐喻涉及意义与表达在修辞、诗学、语言以及思维诸领域内的转换与生成。

隐喻具有转换生成的生命形态,而生命也具有转换生成的隐喻本质。

下面我们就从隐喻的生存环境、生存形态、工作机制、存在理由这四个方面入手对此进行探讨。

## 隐喻的生存环境

首先我们需要对隐喻进行分类。为达到这个目的,一套有效的分类标准是绝对必要的。有人曾提出若干区分隐喻的“参数”,诸如对概念—语言的不同侧重、常规化与基础性程度之类<sup>④</sup>。像“人生是一场戏”就是一个基本的惯用概念隐喻,而“羲和敲日玻璃声”则正好相反(当然,此外还存在着大量不同级别的中间态隐喻)。尽管如此,研究者在隐喻的具体分类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甚至互相矛盾。

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讲,隐喻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家族内部的个体(组)间虽不无相似性,但总体上缺乏作为恒定本质的共同点。“家族相似性”这个隐喻暗示了隐喻本身是某种不断转换生成的生命机体。生命体的特点是它能够在变化中保持自身同一(identity);同理,隐喻生命体的存在形态不断发生转换而展开自身所蕴含的多种生成潜能,这种变化着的自身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拒斥着“标准”,但它同时又充当了某种“终极标准”或“绝对标准”。在此意义上讲,研究者仍可通过动态描述的方式来统贯把握本不兼容于单一界定之下的各类隐喻。

① Goodman, Nelson. 1976. *Language of Ar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73.

② Wellek, Rene & Warren, Austin. 1942. *Theory of Literature*.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

③ Paul, Ricoeur. 1975. *La Métaphor Vive*. Paris: Edition du Seuil. 61.

④ Lakoff, George & Turner, Mark.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5—56.

循此思路,对隐喻进行分类首先需要考察这种机体的生存环境。应当看到,隐喻的生存环境是有层级性的。有论者把隐喻分为“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s)与“非语言隐喻”(non-linguistic metaphors,如绘画、音乐、宗教)两种<sup>①</sup>,这种两分法未免过于简略,并且它淡化了这样一项重要事实,即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与日常行为之中,“我们赖以思维、行动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sup>②</sup>。有鉴于此,本文主张将隐喻的生存环境划分为三个“群落”或层面:语言、思维和现实。这里的“语言”是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语音—文字表达)<sup>③</sup>;第二个层面包括“基干隐喻”(radical metaphor)、“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隐喻思维”(如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比”与“模型”);最后一项“现实”层面包括实物与行为,如建筑、服饰、礼节、艺术等等。前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隐喻的“审美”(aesthetic)与“认知”(cognitive)二维。至于第三类情况(实物与行为隐喻),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它们可以看成是经过特殊方式表达的隐喻话语,如舞蹈语言、戏曲程式等等,其中无疑包含有独特的隐喻概念;另一方面,它们有时会涉及审美与认知之外的道德伦理问题<sup>④</sup>,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另外,它们也可能充当认知工具(如几何图形、直观教具、统计表格等等)。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层面,对于后一种情况暂不予以过多考虑。

语言与思维是隐喻中互为表里的二维,它们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互渗交叉的亚层面。有些西方隐喻研究者建议将隐喻划分

① Indurkha, Bipin. 1992. *Metaphor and Cogniti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4 & 18—19.

②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③ 塞缪尔·R·列文所说的“一般隐喻语言”、“日常隐喻语言”与“文学隐喻语言”都属于这个层面。c. f. Levin, Samuel R. *Language, concepts, and worlds: Three domains of metaphor* in Sacks, Sheldon (ed.). 1980. *On Metaphor*.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2—113.

④ 有时也会有重叠交叉,如“同情”(sympathy)既是认知原则、审美原则,同时也可充当道德原则。

为四层:语义层、语用层、(狭义的)哲学层(研讨“意义”与“指涉”间的关系)以及扩展层(接近于“非语言隐喻”)<sup>①</sup>。这一划分立足于一般语言,几乎完全忽略了隐喻的审美维度,而且把目光局限在语词(lexicon)一隅(尽管是重要的一隅),因而也不够完善。例如,当代隐喻互动论大家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曾断言隐喻与写(拼)法、语音以及语法结构无关,但事实上隐喻作为“意义表达的变换”(variation in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s)不仅与词汇有关,而且是“词法—语法性的”(lexicogrammatical)<sup>②</sup>。在隐喻中,拼法、语音和语法结构与语词一道参与了意义的转换生成。隐喻可以存在于语音层,——如“头韵”(alliteration)、“双关”、“拟声(象声)”即是一种语音隐喻,在此语音的变化导致了意义的变化,——也可以出现在字法、句法层(如拆字、对仗、回文)甚至文体结构层,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谓“原型”或“组织性隐喻”(organizing metaphors)<sup>③</sup>即属于后一种情况。

鉴于隐喻生存环境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在隐喻的主要显现域——话语层面中进一步区分出若干类型。从历时性角度看,这些类型先后在不同阶段作为研究重点而出现;根据存在(历史)与思维(精神)的同步发展规律(维柯—黑格尔),这些历时类型同时充当了隐喻研究的共时模式,它们是:

1. 修辞学的形态与模式
2. 诗学的形态与模式
3. 语言学的形态与模式
4. 哲学的形态与模式

话语层面中的隐喻在此三分为隐喻修辞、文学隐喻与一般语言。事实上,隐喻研究同语言研究密不可分,后者同时支持着修辞、诗

① Preminger, Alex (ed.). *The Princeton Handbook of Poetic Terms*. 138.

②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320.

③ Frye, Northrop. 1957. *Anatomy of Critic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4&141.

学、哲学领域内的隐喻研究。正是通过语言学技术支持,人类得以不断加深对隐喻的认识并最终深入其哲学本质的。这里强调一点,即隐喻研究的历时发展形态不可能如此截然分明;相反,它体现为渐变的连续体(continuum),即前一阶段的发展上限往往同时也是后一阶段的萌芽。这一特点同样也体现在隐喻研究模式的划分之中,如隐喻的修辞—诗学研究本身即属于隐喻语言研究领域,无必要也不可能将它们强行区分开来。

根据上述层次划分原则,隐喻的共时分类大致确定如下:

修辞层面的隐喻: 隐喻(implicit metaphor)、明喻、换喻(metonymy)、隅喻(synecdoche)、讽喻(allegory)、奇喻(conceit)、拟人、反讽……
诗学层面的隐喻: 隐喻、意象、讽喻、象征、神话、原型……
语言学层面的隐喻: 语音隐喻、词汇隐喻、句法隐喻……
哲学层面的隐喻: 根隐喻(root metaphor) - 基于隐喻(radical metaphor) - 概念隐喻、创造相似的隐喻(similarity - creating metaphor)、模型(model)……

这里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这是一张共时的隐喻分类表,它并未涉及隐喻的历时形态<sup>①</sup>;第二,某些隐喻可能现于多个层面(例如“讽喻”)或分属不同的层面,如“头韵”就是一种修辞性的语音隐喻,再如所谓“混合隐喻”(mixed metaphor)同样也兼具词汇隐喻、奇喻或嘎喻(catachresis)<sup>②</sup>的身份;第三,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此处的隐喻种类甚至划分标准都是西方式的,这对悠久丰厚的中国隐喻研究传统来说似乎不大公平。事实上这正是本

① 但不排除这样的事实,即某些沿用至今的隐喻形态在历史上曾作为“隐喻典型”(metaphor par excellence)而出现(如西欧中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的“象征”即是一例)。

② “嘎喻”意谓乖涩不合情理的隐喻,有时与“混合隐喻”相混用。兹举两例,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贺:《李凭箜篌引》),再如“刁妻如歪牛轭,要驾驭她如同伸手抓蝎子”(《圣经后典》“便希拉智训”26:7,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0页)。

文所面临的一个操作难点:一方面,中西隐喻研究传统中的某些范畴、术语和概念确实能够相通(如“意象 - image”、“双声 - alliteration”)、对接(如“象征 - symbol”)或者互补(如“讽譬 - allegory”),但其中也有一些范畴、术语和概念,它们在各自本土文化语境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和传统,彼此间并不一一对应,而是存在着交错叠加现象(像西方的“神话 - mythos”、中国的“兴”与“境”),让它们成为中西共享的隐喻研究资源并非一件易事。

## 隐喻的生存形态

另外隐喻还可以从历时性角度进行分类。如有人主张把隐喻区分为“新创的”(newly - invented)、“死的”(dead)与“磨损的”(worn - out)三种形态<sup>①</sup>,还有人更区分出“活泼的隐喻”(live)、“衰亡的隐喻”(dying metaphor,即熟滥的隐喻)、“死隐喻”(dead metaphor,如“桌脚”、“胡说”、“发火”之类)与“化石隐喻”(fossilized metaphor,指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语词,古汉语中的外来语也属于这类情况)四种形态<sup>②</sup>。所谓“化石隐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死隐喻”,“新创隐喻”无疑属于“活泼的隐喻”,而“磨损的隐喻”与“衰亡的隐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隐喻的历时形态便分为三种,用麦克斯·布莱克的术语讲,即:无法挽救的“死隐喻”(extinct metaphor)、仍可激活的“睡眠隐喻”(dormant metaphor)和最具生命力的“活性隐喻”(active metaphor)<sup>③</sup>。

这三种隐喻形态依次进行转换,便构成了隐喻生命演化连续体(continuum);而这一转换生成过程的进化临界点(evolutionary crisis)即是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differentia)。但问题是:这个

① Orwell, George.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Lodge, David (ed.). 1972. 20<sup>th</sup>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Longman. 362.

② Hartwell, Patrick. 1982. *Open to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7—308.

③ Black, Max. *More about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25.



区分标准应当如何确定呢？

从共时角度来看，一切隐喻都具有相似的机体构造，即“主旨”(tenor)、“载体”(vehicle)和“依据”(ground)。作为主旨与载体的复合体，隐喻中结合了所说或所思的“深层观念”(the underlying idea)以及用来比拟的“想像性质”或“相似物”。隐喻的主旨与载体往往并不对等，二者相差愈远，隐喻内部的“张力”也就愈大，为此隐喻需要某种“依据”来维持自身存在；“依据”有两种，包括事物间的“直接类似”(direct resemblance)或人们对之具有的“共同心态”(common attitude)<sup>①</sup>。例如，在“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这个隐喻中，“爱人”是“主旨”，而“玫瑰”则为其“载体”，它们所共有的“芬芳鲜艳”(物理特征)、“娇美可爱”(主观感受)便充当了这个隐喻的“依据”。

隐喻中张力结构的变化决定着隐喻形态的历时发展；换言之，主旨与载体的动态关系构成了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黑格尔曾按照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理念)的关系将艺术及艺术史分为历时的象征、古典及浪漫三型，认为隐喻(“完全缩写的明喻”)是一种“自觉的象征”(《美学》第2卷第3章B)。事实上，象征艺术内部同样存在着象征(“不自觉的象征”)、古典(“崇高的象征”)与浪漫(“自觉的象征”)三个发展阶段，隐喻自然也不例外。隐喻中载体(表达形式)与“主旨”(表达内容)间的张力情况决定了隐喻生命形态的演化进程，即其恒由“质胜于文”(用黑格尔的话讲，即“理念还没有在它本身找到所要的形式，所以还是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sup>②</sup>)走向“文质彬彬”(即理念和形式“形成自由而完满的协调”)，最后发展到“文胜于质”(即形式相对超越于理念，二者重新产生“对立与差异”)而开始新的生命轮回。在隐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载体“企慕”主旨但又难以捕捉主旨，二者间的张力达

到峰值，这时便出现了堆砌笨拙或尖新佶屈的奇喻、嘎喻及混合隐喻等等；在第二阶段，载体与主旨均衡对称，二者间的张力值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这一阶段成为隐喻的主要显现域；在第三个阶段，载体超越甚至代替了主旨，二者间的张力值跌破最高下限而趋近于零，这时隐喻开始消失并转化为普通语言。上文所说的“活泼的隐喻”、“新创的隐喻”、“活性隐喻”即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睡眠隐喻”、“磨损的隐喻”、“衰亡的隐喻”处于第二阶段，而“死隐喻”与“化石隐喻”则处于隐喻生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演化阶段，此时隐喻就完全融入了普通语言。不过，后者并非绝对是“无法挽救”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如在诗歌或行话中)经过特殊处理(如“陌生化”、“前景突出”)仍有可能重新激活。所谓“一切语言均由消亡了的隐喻构成，而后者的尸骸为其提供了生发的土壤”(“All languages are composed of dead metaphors as the soil of corpses”)<sup>③</sup>，如“腕(万)儿”(近代江湖黑话，意谓“名字”)以本义形式销声匿迹多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又以“大腕儿”(演艺界名流)的隐喻面目流行于世，但最近又有“磨损”为普通语言的迹象。

隐喻和语言彼此并不外在于对方，二者同源共生并不断相互转化：语言是隐喻的起点与归宿，而隐喻也为语言提供了更新和再生的动力。这一点正是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不断予以深化的一个伟大发现。不妨说，隐喻生命形态的历时变化来自语言和思维的中“美”(情感—修辞)、“真”(逻辑—认知)二维的转换生成。

## 隐喻的工作机制

上文指出，隐喻是一种意义函数关系(功能体)；与之相应，它具有一整套转换生成的工作机制。在西方隐喻研究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相关学说，它们是：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代替论(substitution theory)和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

<sup>①</sup>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6 & 117—118.

<sup>②</sup> 黑格尔：《美学》序论四(2)，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5页以下(下引同)。

<sup>③</sup> Empson, William. 1966.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New Directions. 25.

“比较论”的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亚氏强调,使用隐喻须首先在“同种同类的事物”间发现“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sup>①</sup>,认为明喻略去说明(关系词)即成为隐喻(《修辞学》第3卷第4章)。这些都是后世所谓“比较论”(确切说是“相似—比较论”、“求同论”)的重要内容。

“替代论”以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连(Quintilian)为代表,后者在《演说的原理》一书中指出修辞的价值在于美化日常语言,而隐喻则是“点缀在风格上的高级饰物”。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如其称道隐喻“最能使风格显得明晰”(《修辞学》第3卷第2章)即具有明显的“替代论”色彩。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I·A·理查兹便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比较论”一味强调事物间的相似,但事实上隐喻中的“主旨”与“载体”常常因为不对等(disparity)而产生“张力”(tension),隐喻即产生于“主旨”与“载体”的紧张、“互动”而非“相似”<sup>②</sup>。这一观点经过麦克斯·布莱克的发挥,便形成了今天的“互动”隐喻理论。布莱克认为“比较论”与“替代论”实际上是一回事,或更确切地讲“比较”是“替代”的一种特例,只不过“替代论”着重的是隐喻取代了普通表达方式,而“比较论”则强调被代替的普通说法与代替它们的隐喻说法具有相似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隐喻虽然涉及“比较”,但“比较”并不总是隐喻的目的(如“God is love”这个隐喻并不是为了比较“上帝”与“仁爱”的相似之处)。事实上,隐喻不仅陈述已有的相似,它更多地是创造新的相似,而这种“创新”即为一种互动的认知过程。

例如在“人生是一场戏”这个隐喻中,“人生”是“主题”(primary subject)而“戏”充当“副题”(secondary subject);二者均为独立的“涵义系统”(system of implications),如“人生”这个涵义系统

①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3卷第2章,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154页;《诗学》第22章,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8页。

②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123, 125 & 93.

中包括诸如“不断流逝的”、“具有不同身份和职责的”等意义项,“戏”这个涵义系统中则包含了诸如“虚幻的”、“按情节表演并有角色分工的”、“需要观众、场地的”等意义项。“主题”(人生)充当隐喻的“框架”(frame),“副题”(戏)则为隐喻提供“聚焦点”(focus);在隐喻中“副题”向“主题”进行投射(project),即“戏”这个涵义系统中的子项意义通过“选择”(如在一定语境下选取“虚幻的”而剔去“需要观众、场地的”)、“压缩”(如将“有情节和有角色分工的”一项并入“具有不同身份和职责的”这一“主题”涵义子项)、“强调”(如突出“虚幻的”这一子项)、“组合”(即形成新的主项涵义系统)的方式而“筛选”(screen)、“过滤”(filter)到“主题”的涵义系统中去,这一互动映射的结果便是“人生是虚幻的、不断流逝的、需要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这一隐喻(新的认识)。

应当承认,上述诸家对“比较论”的批评不无道理。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比较”并不一味强调相似,其中也包含了“互动”论的思想萌芽。在某种程度上讲,“比较”、“替代”、“互动”都是隐喻之“转换生成”工作机制的同位表述。另外,互动论本身也并不是毫无破绽,如瑟尔(John R. Searl)即批评它“错误地预设隐喻产生于本义字句之中”,但隐喻义未必尽都产生于语句各成分间的互动(如在“萨利是一块冰”这个隐喻中,主题“萨利”为一专有名词,它不具任何“涵义”,因而无法过滤、筛选副题“冰”所具有的“涵义”)<sup>①</sup>。布莱克虽然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专名亦不乏“涵义”(如“萨利”必然具有“人”的某些特征),但他也承认互动论确实有所不足,如其未曾留意“隐喻思维”(metaphoric thought)这一关键问题,因而无法究竟在隐喻中甲事物是如何被看成为乙事物的<sup>②</sup>。

隐喻“体验”(bodily experience)论比较圆满地解答了上述难

① Searle, John R.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94.

② Black, Max. *How Metaphor Works: A Reply to Donald Davidson in On Metaphor*. 192.

题。“体验”论强调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另一不同事物,而充当这一“某事物”的,究其根本乃是人类的身体经验。换言之,人类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泛灵投射”(韦勒克-沃伦)来建构(概念)世界,同时这一隐喻式“体验—认知”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投射,它的输入信息、投射特征及类型均受到“身体机能与经验”的极大限制。这样看来,意义转换生成的场所就从互动的话语(无论是“主旨—载体”还是“字句义—言者意”)扩展到互动的物(客观现实)我(认知主体)、思维与存在,而隐喻问题也因此而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替代”、“互动”的工作原理以及“投射”、“聚焦”、“选择”、“压缩”、“强调”、“组合”等工作机制依然有效,但就不再局限于方法论或认识论的层面了。这样看来,隐喻就是修辞、诗学、语言以及思维诸领域内意义转换生成的功能函数;不仅它具有转换生成的生命形态,存在也具有转换生成的隐喻本质。有鉴于此,作者以“转换生成”一词来概括隐喻的存在形态与工作机制。

## 隐喻的存在理由

现在我们来思考隐喻的存在理由,即隐喻有何作用和价值。

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隐喻?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情感要求、修辞策略以及认知的必需。说隐喻是情感的需要,是因为它本质倾向于在不同感觉、经验和认识领域中发现相似之处,隐喻者由此会产生“似曾相识”的心态,而心灵在观察熟悉的对象时往往因“轻车熟路”而感到松弛自在<sup>①</sup>。其次,隐喻具有化异为同的亲功能,隐喻的收一发者由此而产生“自己人”或“非我族类”的认同感;大而言之,隐喻(如文学艺术、礼仪制度)甚至也是一个民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休谟:《人性论》第2卷第2章第4节,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下卷第392页。

族、国家或社会保持向心凝聚、维护稳定团结的不二法门。

按照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看法,隐喻的价值体现为它以较少的语言表达了较多的内容<sup>①</sup>。但“以少总多”的言说方式并不仅仅限于修辞,它也是一种不得而然的认知策略<sup>②</sup>。因此,就其语言表达形态而论,隐喻具有修辞与认知两大功能:前者的目的在于“踵饰增华”,而认知隐喻则属于“强为之言”的言说和思维策略。进一步加以分析的话,修辞还可为审美修辞与非审美的政教修辞(“成仁之方”、微辞曲笔),而审美修辞又可再分为“积极审美修辞”与“消极审美修辞”两种。

关于隐喻修辞的审美功用,前人论述已备。在十八世纪之前,审美修辞一直都是西方隐喻研究的主体。无论是“比较”论者还是“替代”论者都强调隐喻的作用在于“美化”本身有所不足的日常语言,即其“外于”语言而能辅助语言实现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如亚理士多德认为隐喻最能使“风格”显得新颖明快,昆体连更赞赏隐喻是“点缀在风格上的高级饰物”。隐喻修辞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审美功能。积极隐喻的作用在于美化表达方式或强化表达效果,一般诗歌隐喻都具有这样的功能。至于消极隐喻,则是为了避免不适当或不愉快的话题内容而采取的某种迂回代言方式。有关“性”、“生殖”、“排泄”、“疾病”、“死亡”的委婉语(euphemism),像“老了”(死了)、“云雨”(性交)、“阴部”(生殖器)、“解手”(小便或大便)等等即属于该种情况。

此外,隐喻还可以作为一种非审美的政教修辞而出现。这种隐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关乎伦理教化的“仁之方”;作为表达不同政见之策略的“微辞曲笔”。鉴于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

① 他管这个叫“文体精简律”(law of stylistic economy)。c. f. Booth, Wayne C. *Metaphor as Rhetoric in On Metaphor*. 55.

② 孔狄亚克(E. B. de Condillac, 1714—1780)曾指出:“符号”将若干“(简单)观念”集结为一种(观念),它大大方便了“精神”对共相“概念”进行言说与思维,而“知识的起源和起步”均有赖于符号的使用(参见《人类知识起源论》,洪洁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3—95页、第267页)。事实上,一切“符号”都是隐喻性的;这样看来,隐喻(符号)就是一种必要的认知手段了。

还很不够,这里不妨稍微展开来谈一谈。

大体上讲,中国古典诗学较为关注隐喻(如所谓“比兴”)的诗教或政教作用,所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诗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礼记·学记》),因此隐喻更多地是一种伦理教化手段<sup>①</sup>。在更多情况下,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术是以微辞曲笔(“春秋笔法”或“显白书写”)的面目出现。根据隐喻者所处地位和隐喻意图的不同,它又可以分为“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隐喻者通过“高贵的谎言”“神道设教”(如古印度婆罗门教宣传梵天神以口、臂、腿、足创造婆罗门、刹帝力、吠舍和首陀罗),以此来加强统治的合法性、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秩序;另如源自图腾制度的“避讳”(包括语音、字形、语义等方面,分别如清代以“元”代“玄”、科举世代以“邱”代“丘”、唐代以“人”代“民”)也属于这一类型。至于后一种类型,它包括“微辞曲笔”、“滑稽突梯”,是隐喻者为反抗或逃避思想及人身的打击迫害而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具有某种潜在的颠覆性或革命性。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类政治隐喻可以相互转换生成。如“春秋笔法”最初体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威权,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但在后世却逐渐改造为一种由下而上的、隐讳以避时难的话语策略(如“避讳”、“曲笔”)乃至审美修辞化为“委婉蕴藉”、“滑稽突梯”的言说与写作风格。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术,也是一种必要的认知策略。认知活动是通过语言与思维来进行的,而语言与思维归根结底具有隐喻本质。人类语言(命名活动)究其初都是些随意的(arbitrary)或根

<sup>①</sup> 西方伦理学(特别是“同情”学派)也格外强调“个人”与“人性”的隐喻关系。如叔本华指出“同情”。

“存在于人性自身”,是“人类意识的本质部分”,它在“变易不居的瞬间种种形式”中展示了“潜在的统一体”——“又一个我自身”即人性(参见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基础”第3部分第6章、第4部分第2章,任力、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9页、第301页)。略有不同的是,前者并不像中国儒家(如荀子)那样强调隐喻的“教化”功能。

据生命经验而启动的(motivated)隐喻投射。前者例如汉语“树”、英语“tree”、法语“arbre”三者所指相同,它们均意谓大型木本植物,但各自的说法(能指)不一样,而这种“不同”并无道理可讲。至于后者,是利用实体化的、空间化的“本体隐喻”、“方位隐喻”,诸如“上下”、“前后”、“里外”、“大小”等等,来表示时间(如“前几天”、“后现代”)、尊卑亲疏关系(如“上峰”、“下手”、“外行”)、程度范围趋势(如“大吃一惊”、“在……指导下”、“情绪高涨”)以及其他抽象观念(如“生闷气”、“放宽心”)。

我们知道,范畴、概念的界线一般都有相当的弹性并因此存在“越界”的可能,而“概念的迁徙”与“范畴的让渡”即意味着隐喻性的“跨领域映射”。今天文艺研究多借用自然科学术语,如“场”、“张力”、“范式”之类,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现有的语言已然老化而丧失表达力,这时我们只能通过隐喻来表达新鲜的感受、思想和事物。语言中的借语(包括外来语)现象即为典型代表<sup>①</sup>。不仅如此,隐喻往往还能突破既定思维范畴而建立新的逻辑联系,为我们提供新的认知角度和模式,并通过类比、投射向未知领域进行创造性扩展,从而生成新的知识与理解。例如文学研究者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美学”对《红楼梦》重新予以解读,从而在同一文本中发现了多个前所未有的意义空间,这里就存在着“意义的跨领域转换生成”;再如仿生学专家根据蝙蝠听觉原理研制出雷达,其中同样运用了隐喻思维。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科学假设和技术模型都是(就认识对象而言)认知性的隐喻,甚至逻辑(如归纳法)也离不开隐喻的启动和支持。

应当看到,隐喻的“修辞”与“认知”这两种身份是相互转换生成的。不错,隐喻是命名直接生命经验或新生事物的必要手段,但它(隐喻性的原始语言)随之会逐渐被推理性的表达方式所取代

<sup>①</sup>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汉语中最近出现的“酷”(原系英语“cool”一词的音译,但意思有所改变,类似“帅”、“时髦”之类)即是。又如港台地区用“表叔”(该词来源于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出现的一句唱词)指代大陆来的亲属,后来又转而用来指代中共党员或亲共人士。



(事实上这也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正常发展过程)。换句话说,虽然隐喻是语言生命的根据和逻辑创造性的动力,但随着语言“去隐喻化”(demetaphorized)为“纯符号”,隐喻就否定了自身与话语—思维的本来联系而工具化为修辞学的形态。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即这种修辞化的形态甚至还会进一步蜕化为普通语言(literal language)。例如,体物的同情(“泛灵投射”)在上古时期是初民赖以认识外界的重要甚至唯一手段,但在理性思维发展起来以后,它就边缘化为某种修辞手段,如所谓“移情”、“拟人”(其实都是“隐喻”),但今天我们谈论“山头”、“路口”、“桌子腿”、“等腰三角形”这一类词时,却几乎一点都意识不到其中的隐喻意味了。

### 隐喻是转换生成的“三”

本文强调隐喻是某种意义于其中转换生成的函数关系。换句话说讲,隐喻的本质是“跨领域映射”,无论这些领域涉及“思维与存在”(如语言与实物符号)抑或“思维与思维”(如真假、同异关系)。这样看来,隐喻恒转换二“一”(领域)、生成新“一”并以“一”涵“三”,而在其生成“三”的那一瞬间,又转换为新的“一”来打通新的“二”并生成新的“三”(三而一);以此类推,乃至无穷。因此,隐喻可以说是转换生成的超验之“三”,它处于(用康德的话讲)“完全的经验空间”与“不可知的本体空间”的“界面”上,并通过“类比关系”作为经验的最高根据(但它本身却非经验的对象)而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sup>①</sup>;显然这是一个永恒的隐喻中介,亦即“本体”(或曰“本体”、“真理”、“精神”)所以“显现”、“异化”(黑格尔)、“侧显”(胡塞尔)、“给出一派遣”(海德格尔)、“分延—在场”(德里达)的根本方式。这样看来,隐喻便取得了哲学存在论的意义。

<sup>①</sup> 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57—60节,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44页、第147—150页、第153—154页。